

您当前所在位置：首页 > 研究 > 理论研究

超越代表制与从属关系：后苏联俄国的集体行为

2010-3-25 14:19:31 作者：艾瑞娜·艾瑞斯塔克娃Irina Aristarkhova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网专稿 人气指数：56 字号：【大 中 小】

注明：未经本站允许，请勿转载！

摘要：今天，冷战正式结束二十年之后，反恐战争开始几年之时，当一个“政治性的思考者”环顾四周的时候，这位俄国知识分子常常会问两个问题：“怨谁？”“下一步该怎办？”但这些问题现在看来有点过时（这是来自于19世纪的问题），而具有当下气息的问题可以更好地归结为“谁在乎？”。似乎我们从不曾远离“集体行为”，甚至，将这些行为组织起来的企图具有反创造性，纵观全局，当考虑到军队与国家机器的职能并无二致时，这些企图就更是如此。本文将探讨90年代苏联之后的俄国，特别针对该时期的两个反对政治冷淡的政治“边缘”：一个是今天被称之为莫斯科行动主义的艺术运动(Moscovcky Akzionism)，在此，通过艺术家、理论家、策展人安托利·奥斯洛莫维奇的作品和思想将这一流派进行呈现；另一个是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该组织现在被确切地称为俄罗斯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即“Union of the Committees of Soldiers' Mothers of Russia”。我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例子来指出政治行为的效力与伦理道德，并将这种行为放置在一个更大的背景当中，即后苏联俄国政治冷淡的危机与代表制度。以此为契机，我将批判性地评价这些行为所引起的对于差异的觉醒与应对（例如母亲式的政治行为），以及利用各种“政治”理论（比如福柯、德里达）所进行的试验的作用。我认为，我称作的“母亲式政治(maternal politics)”植根于对列维纳斯和艾瑞格瑞的批判式阅读，这种政治象征了另外一种政治主体概念，并且开启了思考政治行为的新路。我这里所说的政治行为所针对的是近来在后苏联俄国经验中的他者性与异质性问题。

翻译：葛玉君 王潭

今天，冷战正式结束二十年之后，反恐战争开始几年之时，当一个“政治性的思考者”环顾四周的时候，这位俄国知识分子常常会问两个问题：“怨谁？”“下一步该怎办？”但这些问题现在看来有点过时（这是来自于19世纪的问题），而具有当下气息的问题可以更好地归结为“谁在乎？”。似乎我们从不曾远离“集体行为”，甚至，将这些行为组织起来的企图具有反创造性，纵观全局，当考虑到军队与国家机器的职能并无二致时，这些企图就更是如此。本文将探讨90年代苏联之后的俄国，特别针对该时期的两个反对政治冷淡的政治“边缘”：一个是今天被称之为莫斯科行动主义的艺术运动(Moscovcky Akzionism)，在此，通过艺术家、理论家、策展人安托利·奥斯洛莫维奇的作品和思想将这一流派进行呈现；另一个是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该组织现在被确切地称为俄罗斯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即“Union of the Committees of Soldiers' Mothers of Russia”。我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例子来指出政治行为的效力与伦理道德，并将这种行为放置在一个更大的背景当中，即后苏联俄国政治冷淡的危机与代表制度。以此为契机，我将批判性地评价这些行为所引起的对于差异的觉醒与应对（例如母亲式的政治行为），以及利用各种“政治”理论（比如福柯、德里达）所进行的试验的作用。我认为，我称作的“母亲式政治(maternal politics)”植根于对列维纳斯和艾瑞格瑞的批判式阅读，这种政治象征了另外一种政治主体概念，并且开启了思考政治行为的新路。我这里所说的政治行为所针对的是近来在后苏联俄国经验中的他者性与异质性问题。

后苏联俄国政治冷淡的自我主义基础

改革初年（1986-1991）令人兴奋，因为这是一次对于俄国民族身份，尤其是对于其暴力历史的自我反思和重新定义的机会。然而，不久之后出现了不要“陷得太深”、不要批得太狠、回归“真正的俄国根源与传统”的呼声（尽管是作为一种政治和艺术策略），加之那种重新定义变成了与（尤其是东正教）历史和解的必然要求，这种反思也就戛然而止了。[1]可以说，俄国东正教堂成为了90年代最强的社会力量，在一种集体失忆的状态中将政治领导人与文化领导人联合起来。

在这种变迁之下，俄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茫然了，但却不仅仅是被日常问题所困。经过了70年的分离（既是实际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现在大部分思想、艺术以及行为显然已经不再是苏联话语、教育或生活的一部分了——在这里指先前那些被归在“1960年代的”运动、艺术作品与文字之下的事物。对于“文化工作者”——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学者、学生——而言，这种情境让他们感到非常迷茫。同时，游人和俄国与苏联历史专家开始使用“苏联与后苏联现状”这样的名称。但是，前前后后的不断反复既没有达到艺术与学术圈的期待，也没有达到市民社会的期待（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本身就能构成一个写作的话题，但我想在此说明的是，这种对比往往会造成严重的误解，这种误解不仅在于指涉（语言或非语言），而且也在于情感和意图。对于马克思主义、性别、政治、民主、俄国民族性格等问题，我们往往被要求对现存“真理”进行

最新推荐

- 超越代表制与从属关系：后苏联俄国的集体行为
- 摆脱模仿 创造中国
- 《聚变：中国当代艺术图鉴：2005-2009》
- 话语与身份
- 独立策展人的权利与义务：顾振清访谈录
- 十年当事人
- 格林伯格之后的艺术理论与批评
- 艺术史写作的多项选择题
- 吕澎关于“改造历史”之种种的答疑
- 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以年鉴的方法纪录历史
- 何桂彦：论如何建立评价2000-2009年当代艺术的价值尺度
- 殷双喜：要注重严谨的艺术个案研究
- 王春辰：今天的艺术勿忘意识形态
- 尹吉男：10年，是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
- 王明贤：10年，当代艺术与建筑全面合作
- 邵亦扬：10年，真正的多元时代刚开始
- 贾方舟对话谷文达
- “意派论”：突破与缺陷
- 模糊的前卫精神
- 吃屎、身体与强权



认可，然后对其做出反应——即我们能够记起的唯一反应——即“保守我们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俄国历史上，90年代可以被称为“保守的十年”，因为这十年，俄国人被要求认可他们的新朋友对于我们“在苏联统治之下”的一切设想，并且通过教导认为他们的客人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更胜一筹。尽管实际情况更为复杂，但俄国人感到了不足和无以应对，这也令他们自闭或者沉默无语。[2]

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守卫的情绪和拒绝对俄国历史的情绪一起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其中很多俄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转而面对自身，将自己当成了研究课题——当然，在艺术和思想史上这种情况并非前所未有。他们的个人怨恨和情感往往表现为苏联或后苏联生活的症候，这是“西方”无法完全理解的。当然，这样的作品无论在审美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能够取得极大的成功，但我想要指出的是它们的“自我”（用列维纳斯的话来说）基础。换言之，这是当遇到异己威胁时的自我保护，不能说这种反应无论如何是一种自然的反射，以此来将问题自然化，并最终中立化。最有意思的问题是文化特征及其谱系，当然这远非本文所能涵盖。

莫斯科行动主义与代表制的危机

观点认为，以奥斯洛莫维奇为代表的莫斯科行动主义是后苏联俄国唯一一个从“左派”（例如俄国与苏联的历史、马克思、列宁、当代反全球化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或“1968年”法国知识分子）派生出来的艺术运动。有意思的是，由于政治左派所创造的计划使得艺术和政治的联系似乎变得顺理成章了。艺术被定位为激进主义，一种直接的公共行为。但另外两位著名的莫斯科行动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布伦尼尔和欧莱格·库里克则不是这样。他们的策略是采取直接的公共行为，这与90年代的社会与经济动荡相一致，但却没有马克思或左派基础。亚历山大·布伦尼尔的行为包括在马列维奇的绘画作品《白底上的白色十字架》（藏于阿姆斯特丹的斯特德里克博物馆）上画一个绿色的美元符号，并走进克里姆林宫宣称从叶利钦手中夺取国家政权。而欧莱格·库里克最为人们所知的则是他的表演《疯狗》（1994莫斯科），后辗转其他城市进行表演，其中赤身裸体的库里克像狗一样嚎叫，并且扑向行人。除此而外，他还组织了《动物派对》。这些行为往往被解释为回应了“90年代的动乱”，而且这些行为作品也经常被著名的越轨（transgression）和卑劣（abjection）理论所解释（比如巴塔耶、精神分析等等）。在此，我将集中讨论一种政治行为和运动：“政府权限之外的窃听任务”（Vnepravitol’ stvennaya Kontrol’ naya Komissiya），1996-2001，组织者：奥斯洛莫维奇以及其他莫斯科艺术家、理论家和活动家：A. Ter-Oganyan, O. Kireev, D. Pimenov, I. Chubarov, D. Gutov, 等人。

在其文本和作品中，奥斯洛莫维奇多次试图面对这种代表制的危机，而不完全抛弃“参与政治的艺术”这个观念。他认为“如果我们缺乏真正的世界知识，加上同质社会结构和亚文化的瓦解，而且无法发展出一套合理的行为，那么，我们将会拒绝一种主要的关于社会管理的政治原则——即代表制原则”。在其发表于1998年的重要论文中，他继续道：

整个民主议会与党派系统的基础是代表制原则的。他们的工作就是表达我们的意见！但现代左派的主要目的不正是创造一种每个人都能拥有己见的社会环境吗？这样就能脱离统一的国家机器了。也许列宁的著名口号“每个女厨师都将能统治国家”就是共产主义制度中每个拥有自己意见的普通社会成员的写照？再者，个人意见的存在本身就应该能够在任何虚饰的统治方式中达成一种保证和全权性。

不要害怕任何疯癫的想法——它们绝不是病理上的疯癫！独一无二与思考的强大“动力”是一个有能力的现代人的标志。想想为什么基里诺夫斯基能够赢得1994年的选举（以及1996年选举，这说明他的成功并非偶然）？只因他有能力！（奥斯洛莫维奇，1998，p. 2-3）

在俄罗斯当代艺术领域，这种不为对方说话的反思与警戒到现在也没有全面地被表述出来，它被视作为一种反对西方化的表面的政治正确性的回应。那些反对政治正确性的草率批评家们认为，这种言论废除了政治，令艺术家无言、无能，失去了行动与合法性的基础。“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样？”一位这样的批评家问道，“什么都不做吗？”。尽管我们不赞成奥斯洛莫维奇将关于代表制的问题从政治家身上转移到艺术家身上，但他强调，反思性是政治艺术最重要的问题，这种言论在90年代的俄国艺术世界中却是独特的。

莫斯科行动主义与情境主义（Situationism）密切相关，他们希望将艺术变为生活去服务社会，而不是去服务艺术市场。令他们出名，并构成了他们的作品的行为是《全部反对运动》。我强调过，这个行为与布伦尼尔和库里克的作品迥然不同，它与俄国选举以及左派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有街头行为，也有出版物和展览。这个作品表明它与选举程序的一个方面有着特定的关系，但却没有对选举做全盘的评价，这与布伦尼尔和库里克的表演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的表演很少和“情境主义”细节发生瓜葛，而是更多地涉及艺术与金钱、艺术的界线等问题，如前所述。《全部反对运动》采取了典型的选举程序。有俄国选单和真实的政治候选人和党派从属，但多了一行标语：“全部反对”（无论是党派还是候选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选民强烈地觉得在选举中没有哪个候选人能够达到他/她的要求，那么，他/她就能选择“全部反对”。奥斯洛莫维奇的运动针对的就是此种选择。另外，根据俄罗斯现行选举法，如果其他候选人或政党收到比“全部反对”的候选人（他们将这种选单选择人性化了——kandidat protiv vsekh）少的选票，或者被“全部反对”候选人收到多于50%的选票，选举立即将作废，而且其他候选人或政党不得再次参加同样的选举。

1990年代，起初并没有很多俄罗斯选民选择“全部反对”。那些不满意其他选择的选民可以直接撕毁选票或根本不参加选举，因此选举程序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候选人更希望选民不来，而不是他们选择“全部反对”——我们知道，在很多国家，选民的无动于衷和不投票能够导致极右派或极端派获选的现象。然而，选择“全部反对”的选民越来越多，这说明人们想要表达对于选择代表制失败的强烈不满。“全部反对”这个行为试图引起人们对于这种选择的注意。这些艺术家和活动家声称他们在“全部反对”的流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亮相媒体，并被FSB（国家安全局）所注意，之后一些参与了这次活动的艺术家还遭到了审讯。但时至今日，“全部反对”的选择已经蔚然成风，以至于当局不得不严肃考虑是否需要取消选票单上“全部反对”的选票空格。

到了1990年代末，俄罗斯的艺术以及更大的文化环境已经和关注责任性、代表制或政治试验分离开来。因为缺乏与所谓的“普通人民”的联系，参与现代政治的艺术家（如奥斯洛莫维奇）似乎已经“极大地脱离了人民”（列宁语），也脱离了当前艺术世界所关注的“谁在乎？”而不是“该怎么办？”这样具有革命性的问题。莫斯科的社会环境变了，奥斯洛莫维奇的策略也发生了改变，他最新策划的展览名叫“不需辩护的艺术”（*Iskusstvo bez opravdaniia*）。在关于这次展览的文章中，他写道：“经过了和压制性的国家体制与私人社会组织的多次艰难的斗争，艺术不得不承认它的行为是有限的。当理解了艺术自身的社会限制之后，就必然要去寻找一些美学上的……拼命让艺术在社会中具有政治重要性，并试图让艺术对政治直接影响是最悲哀、是最可笑的。在此，艺术就是自己的障碍。艺术的有效性和政治的有效性是不能共存的。”（奥斯洛莫维奇，2004:6-7，笔者翻译）

也许奥斯洛莫维奇是90年代俄罗斯最具有政治倾向的艺术家，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也体现在他的艺术创造和他在一个变革时代中对于艺术地位的不断探寻。对于我们在此谈论的更大的政治问题，比如艺术的道德、策略、责任和社会关系，他的立场似乎变得越来越笼统，并且具有超理论性。在前面所引述有关于他写的艺术和政治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将艺术家的经验概括成为艺术本身和90年代情境主义的警觉，这种论调似乎被一种更为重要，但绝不具有对抗性的美学问题所取代。1990年代莫斯科的情况非常特殊，同时，只有很少部分人对政治艺术感兴趣。我在前一个部分已经强调过，在苏联的统治下，政治是被误认为一切对艺术（或被形式主义者认对二十年代的前卫艺术而言）所产生的“坏的因素”。在缺少俄罗斯艺术世界支持的情况下，并且随着国家对公共生活的不断控制，可以说奥斯洛莫维奇和其他该团体的成员只能“继续前进”。而且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但是他们必须前进吗？在本文的下一个部分，我将论述基于从属关系和代表制的政治的主要问题，之后在介绍另一种政治，这种政治抛弃了从属关系和代表制，是俄罗斯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的政治行为模式。

从属关系与代表制之间

在传统意义上，国家的概念与公民社会相对抗。福柯等人指出，这种对抗性已经不具有政治斗争效力了：“在历史的任何时间中，国家并没有统一性、个人性、强大的功能性，坦白地说，国家并不重要；最后，国家只不过是一种想象的现实、神话了的抽象，远没有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重要。”（福柯，1991a:103）在对政治维度进行分析的时候，福柯用了“政府性（governmentality）”这个词来取代国家。的确，在今天看来，国家的政府化也许比福柯所说的社会的“国家化（state-ization）”更有意义。在福柯的政治分析中，还有一点与此相关，即权力再也不能被压制性地呈现了，就像某种从上至下的东西那样（福柯，1978/1990:81-102.）。当前，政治出现了新的情况，权力的分配和实施威胁着更广大、更稳定的政治体的生存和成长。

国家的危机在很多地区激发了非政府组织的大量增长，即所谓的“第三行业”。这种社会组织试图弥补国家的政府化并提升团体性的利益。但这些组织往往面临着和以此为基础的国家或政党一样的问题——代表制的问题。如果国家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就像在传统的政治话语中那样，那么国家的衰弱将影响它本身的外在表现。代表制度是国家的功能，但当国家变成了另一个政府成员的时候，NGO就会立即对这种代表制度的危机进行回应——尽管非政府组织会参与并成长在国家的衰弱中，但它依然会继续填补由于国家的缺失而留下的空间或功能。因此，国家的危机会导致更广泛意义上的代表制危机。

尤其是具有当前政治形式的代表制度意味着一致性的价值观、目标或信念的同质性。通常，这种同质性的基础是这样的一种宣称：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信念、需求和兴趣，并为这些而斗争，因此他们就需要有人为他们做代表。但没过多久问题就出现了，因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并且无法相互协调的需要和信念，以此无法统一在一种政治系统和斗争中，因此，在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被进行了不同的划分。[3]意识形态加强了党派政治，这种被写成规则或宣言的意识形态为党派选择策略、计谋、行为和代表的范围提供了一个原则性基础，也就是谁属于，或谁不属于该党派，按照什么规定等等。代表制和意识形态的危机引起了党派政治，或任何依靠从属关系而建立的政治的危机，因为他们都是相互依靠的。共同的目标和原则正在瓦解，不同意见正在蔓延，这些异议依然被视为对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威胁；代表们的宣言遭到强烈反对。福柯倡导用微观实践取代超意识形态，这种论调令身份政治恐惧焦虑，也令政治行为丢失甚至消融。[4]

代表制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反过来说又必须有政治从属关系作支撑，也就是说，一个政党、一个群体等，将某种意识形态作为一部分。有的时候被称作为党“献身”，即将一个人的所有精力都用来和该组织的成员一道，为某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当然，从属关联与“亲近（*philia*）”直接相关，这种亲近意味着爱和友谊，并将党派的敌友区分开来。按照这个逻辑，没有了敌人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政治斗争的基础。德里达在《友情政治》（*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一书中批判性地分析了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dt）的古典公式，他说：“失去了敌人也就意味

着失去了政治意义上的‘我’。当前，能够找到一些政治领域中这种不知所向的例子，其中主要的敌人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 [5]

德里达通过重新构建超越了敌友对抗的“兄弟友谊”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政治可能性，而我则希望追溯这种另外的可能性，与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同，这种可能性建立在我称之为“母亲式政治”的基础之上。

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

处在危机和重大变革时期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任务如下：重新定义“政治性的受支配者”的意义与去向。作为反对艺术家和知识阶层被通常指控在这方面的失败，俄罗斯的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引发了一个典范成功超越了代表制、政党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从属关系的危机。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创建于1989年，它工作于几个不同领域，或多或少与军事和其他政治团体相关联——特别致力于对它们的改造。它为牺牲士兵的家庭提供法律援助并寻求经济上的帮助；在国家强制兵役的法律方面进行协商，大力发展关于军队死亡案例的出版物，在国会听证会上游说赦免法和军事改革。在反对俄罗斯对车臣的战争中，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是极少组织中的一个，但却不可思议的成为最活跃、最出色的一个。在车臣，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在引起这战争的关注和停止军事上的进攻作出了直接的工作行动。除去一些与军队相关的人权刊物外，他们还要求妇女也应参与到军事决策中来。1995年，因其在战争中的表现，它被授予肖恩·麦克布赖德和平奖，仅在莫斯科，得到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救助的人数就达一万多。此外，侵犯人权的个人投诉几乎百分之百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最近所有地区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的访客总数有四千人左右（此处和其他地方的数据来自2002年UCSMR的年度报告，详见<http://www.ucsmr.ru>，以及2000年、2002年的Melnikova和一些私人信件。）

为了全面的理解这种首创精神的成功和成就，我们需要思考在俄罗斯“母亲”与“母爱”观念的政治意义和道德力量。我们特别需要思考母爱这个观念运作的方式以及它打破“我们”与“他们”之间分裂的逻辑所用的方式。传统强调母亲源自一个关切与亲密的领域。在这种惯例下，母亲的形象在敌人被当作他者抛弃前都视他为潜在的盟友。（例如这在列维纳斯的观点中得到了证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文学的文化想象中得到了支持，甚至这种母性无差别的爱被用作支持革命，比如高尔基在1907完成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小说《母亲》。如接下来分析的，通过从私密（家庭）推延至公共场合（社区），母亲联盟委员会超越了在盟友基础上与其他群体和组织合作的问题。“敌人”的缺失并没有限制或者降低它的政治能动性，因为母亲的观念对进退两难的困境是矛盾的——每一个敌人都有一个母亲。母性和母爱（虽然没有必要相关）要考虑没有理由的对他人表达关爱或者需要确认他的诚意。政治、意识形态的结盟观念在母爱的语境中没有任何意义。相应的，母亲利益的有效性和信念也不需要一个规划、代码或者立法。

列维纳斯、伊利格瑞和母性身份的政治

在过去的数十年内，母亲和母性的观念在女性主义文学中得到了积极地讨论，尤其是通过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和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鲁希拉·康奈尔（Drucilla Cornell）研究了母性和母性身份的伦理含义。除此之外，他们的观念还希望将现代话语转向伦理学与主体性，他们与政治策略和观念的产生有直接的关联。不幸的是，这种与政治政治行动直接相关的政治因素，经常缺乏探索，造成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裂，使双方都失去意义和价值。

就我们公共传统和哲学传统的定义来看，母亲，如列维纳斯提到的，是“为别人的生物，而不是为她自己”（列维纳斯，引自 Chaliel, 1991:126.），照顾的观念——由列维纳斯的朋友和早期导师——海德格尔发展——被萨特视作否定的消极含义，列维纳斯对“照顾”的思考基于母性，通常是一种可能性，是对积极道德观念和类似伦理的接纳。显然，这种朋友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没有首先将他人暗示为潜在的敌人，而是不同政治种类的可能性，这一切在母亲联合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具体形式和没有“忘记母亲”的标语中得到了发展。（就列维纳斯的著作来说）

列维纳斯将母性关系视作一扇门，这扇门朝向伦理和宗教。然而母性关系只是一个消极的可能性，通过打开自己在社会和文化的领域中得以呈现。同样，对于克里斯蒂娃而言——母性关系的体验是前俄狄浦斯式的，也就是说，它外在于文化与社会的确立。在这种意义上，它正是伦理和政治的起源，结果，接踵而至的它们却将母亲抛在了背后。正如克里斯蒂娃，对于列维纳斯而言母性是前社会与前文化的。支持了列维纳斯的母亲的主要功能，对我们的分析必不可少的是同他者的关系。在母亲的帮助下，列维纳斯论述道，一个人可以站在敌人/朋友之外的立场上与他人相关，制造不可能的可能——战胜没有个体生物陷入世界的存在论。就列维纳斯来说，它变得更为普遍——母亲所处的位置为的是提高伦理的关系，尽管母亲自身在伦理的领域没有立足之处，但却成为它的场域与起源。

当母性被甩在后面时，我们必须质问我们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母亲被留在身后，为什么那个家园被隔离在世界之外？又为什么母亲最初被放置在家庭之内？母性的作用，如伊利格瑞指出的，为社会和政治秩序提供了一个基础，对于欲望的秩序而言也是同样，但是母亲自身总是被她的必要性限制。就必要性而言——个体或者集体的一一被履行的，除去母性的功能一无所有。母亲的能量除去满足她自己的欲望和需求也一无所有，特别是在宗教、政治和社会的维度内。（伊利格瑞，1991年）。很明确的说，在某些意义上政治即母性的，或者反之母性即政治的都与政治和哲学的传统背道而驰，因为这些传统最初就是建立在遗弃母亲之上的。自从传统的母亲被驱逐出民用和军

用社会，就这样的文化而言，遗留下来的仅仅是“母亲的观念”（an idea of mother），它可以转义为祖国和故乡。母亲本身只是作为一个象征被接受。

在公众领域的内部或者前方提及时，母亲仍然必须停留在社会和宗教的领域之外，当不涉及男性的政治主观性时，母亲便不能成为一个政治的积极分子。母亲表现出失语与前文化特征，在自我之前的所有一切都是在政治上相关联的。这种列维纳斯式的立场破坏了他获取新差异性道德的主张（反对一致性的存在论传统），因为它从确认开始，然后容纳了母亲的差异。它将母亲从政治、社会、文化，特别是神学的领域中流放。它将母性经验匹配到另外一个水平线上——道德的水平线和与他者的适当关系。

伊利格瑞曾经论述到西方传统实际上是一个弑母的传统，由于我们文化的繁殖和繁殖本身成为一种政治隐喻，母亲的形象也象征性的被湮灭了。所以，母亲主动同时呈现为母亲和政治积极分子，这在基于反对母性身份的政治领域是难以接受的。这种母亲在政治上的回归——不是作为文学或者哲学的风格而是具体的政治行动者——构成了一个稀有的现象。这些作品，尤其是在后苏联时代，运用在母亲形象上的两种形式：古代基督与苏维埃，合成与利用这两种强大尽管相对的形式片段成为可能。

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的政治革新与成效

一方面，在俄罗斯正统基督教下，一种“母性”和“母亲”所享有的社会与文化的重要性帮助了母系政治的成功。（我想在这里强调，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正在操纵着这些构想，这并不是为了毫无批判地接受合理的“母性”的定义，而是为了他们自身的政治斗争。这是他们从现存的文化语境中挪用过来的手段之一，而且参与者是否相信它，也与他们的行动无关。）另一方面，在苏联时期，妇女角色的政治化开启了对女性作为一个积极的政治主体的构想。例如，克里斯蒂娃特别提到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把妇女作为一股社会政治力量来看待，允许女性在一种“毫无奴性以及归顺感和排斥感的状态下成长”。（克里斯蒂娃，1987:117）先不管克里斯蒂娃这种陈述的问题（在苏联时期，任何的政治认同都是一个问题重重的概念，甚至可以被当作一种美好愿望来对待，更不用提这种被任命的主体身份，与男性主体不相上下的身份，并没有对性别歧视的状态有多大改变），很明显，苏联的女性公民被象征性地、字面上地认为是在政府化的过程中的积极政治主体（我曾在其他地方争论过，这一进程在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要早早地先于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改革。见阿莉斯塔娃，1995，第三章）。而且，的确，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的模式在许多方面都严重借鉴了他们苏联的女前辈们。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坚持在社会范围内女性力量的沉默的其他文化力量的存在，并且它使得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在将女性实践注入政治活动家的领域中所作的努力是多变的。根据沙利耶在列维纳斯中所说的，“母体知道其主观性”只有“通过它的血肉。”然而，留给女人的伦理学，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只能是来自“作为母亲”这一种身份的，别无其他。来自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的母亲们，就是把把这个“别无其他”转变成了把母性角色政治化的勇气，以及从抗议与从属的政治危机中寻找出路的一个途径。

母系政治活动并不依赖于常规的政府捐赠以达到统一的思想，因为母亲这个概念允许“一些母亲”在不消除她们的差异下互相扮演着有形的身份。在不需要“通过信念”签署或声明一些共识的前提下，为她们的政治激进主义提供了一个平台。母亲们不需要去签署一个母性的章程或项目。因此，从属的问题便不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它是针对那些内化政治的问题。她们的密码是“理想化的”并且是“超越”政治观念形态的，因为大多数观念形态都在试图达到那些不可能的——正如只有母亲们具备的，道德的力量和合理化的行动方式（就定义来讲，即爱并关心他人，而不是他们自己）。对于政治党派和团体来说，模仿前俄狄浦斯幻想时期的体贴、具牺牲精神的形象是再寻常不过的了（例如苏维埃政权的标语之一“党如母亲一般爱你”）。

当一个事物代表着另一个事物的时候，它把自己放在与那个被代表的事物同一的水平上。同一性是代表的基础，差异性往往从根本上破坏代表制的政治。一个事物与它所代表的事物越相像（在阶层上、性取向上、性别上、民族上、缺陷上、年龄上等等），它就越拥有更多的代表权。但士兵的母亲们却不同。她们不代表其他爱自己孩子的母亲们，她们代表的是那些与她们完全不同的，但却与她们通过母亲身份的象征而相关联的人们——任何实际的或潜在的士兵。

她们声称他们为自己潜在的孩子们，尽管他们可能与她们在任何社会上和文化上所代表的意味深长的层面——民族、宗教、性取向、性别、年龄等，不尽相同。亲属关系通常甚至不被合理地包含在政治范畴内，由于它们属于家庭法之中，但是在任何事件中大多数时候他们代表其他人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的事例中代表性的问题以及它的危机，并没有破坏到他们的斗争和激进主义（尽管这必须每隔一天就协商一次，但它并不是名字所带来的问题，而是所内含的行动，以及战术和策略的调整。）母系政治看上去像是传统地以消极的母性作用为己任，通过将自己积极地消解在母爱中，使它成为其政治斗争的源泉之一。这样，母爱证明自己是一种盗用艺术家及知识分子传统角色的政治主体性的政治起源。

许多人对这种母性作为任何一种政治源泉的介入提出异议。一些女性主义的政治著作，尤其是西方的著作，认为母性是一个女人成为政治激进主义者的障碍，特别是在当下的社会与文化制度中。这种情况下，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即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把对母性的传统看法否决为社会、宗教或文化的思想或刻板模式的观念。即使是对法国女性主义者进行社会和政治上的主体化，也意味着否定当今对母性的理解。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实际上恰巧与此做

法相反——它将它（母性）置于其政治上的中心议程中，而不定义和讨论它（母性）。它更新并更正了关于母性的传统理解，这种传统理解已被剥去一切公共的含义并被限制在前俄狄浦斯、家、家乡、房子、居所、亲密行为的沉寂之中，并且，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还给它在国家军事机器之内的政治斗争之中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的确，士兵母亲们将她们的政治根基放在母性经验上，并且她们将这种“简化的”显著的功能置于她们的行动之上。她们承担这种风险。她们展现出如果这种战术在被以一种境遇主义的方式使用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策略将会是多么的有效。通过试验和错误，她们不断地微调战术。谁、什么时候、如何实施母性政治，与其局限性和危险性的全面理解，以及面对它们所需的准备将给结果带来同样多的内容。

为了行之有效，母性政治从它的特殊语境中吸取，极为灵活多变地回应它。因此，她们的政治行动质疑信奉普救说者在西方和俄国的母性理论下讨论母性实践时笼统的一概而论——认为它们或者是精神分析学中的后拉康主义，或者是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亦或是俄罗斯的东正教。在后苏联时代占主要地位的东正教语境中，即那种对自身民族的和宗教的异质性仍旧盲目的语境中，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并没有对母亲们实行去主观化的行为（伊莉格瑞和其他天主教语境内所暗指的），而是对她们进行再主观化（由于她们已经被苏维埃政府界定为政治主体）。她们制定并使用传统地远置于母性之外但根基于母性的结构（例如，军队和经济总是需求“年轻力量”）。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行动将立场和母性的位置问题置于政治的、合法的及伦理的问题中心，并将它从家庭计划问题转变成为政府、公民权利、军事实践和法律本身的问题之上。通过将它们自身置于这些层面中，将对“母亲”的关注转移到“孩子—所有公民”身上，她们激进并卓有成效地避免家庭、社会的二元论。毫无疑问，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主观性的形式，它开启了一种在来自他人的母性以及针对他人的母性间的伦理关系的可能性。伊莉格瑞、康奈尔以及其他关于在母性的行为准则和法律的方面重新界定母性的概念的作品都是尽人皆知的。然而，包含在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中母性政治力量强迫我们这些理论家们，要时常地将我们的观念本土化，并且以现存的政治激进主义的新思想和实践与之协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激进化为基于敌/友范式的现存政治危机创造出路的过程。

毫无疑问，这很有可能引起对士兵母亲委员会联盟及其行动，还有对我从他们的工作中得来的“母性政治”的观念的指责声音。当母亲被通过利他主义和自我否定来定义时，一个人便能够声明他们的行动是对母性的牺牲性常态的复制。他也可以声明完全相反的内容——他们的工作揭示了母性也通常是残酷的和利己的，因为母亲们需要她们的孩子们去实现其自我价值，从而像财产和交换价值那样使用他们。这也很可能宣称她们是具有政治反动性的，而且这样的组织也是不稳定的。当然，她们的所作所为是独特的，也不能仅仅被视为一些人的简单实践而已。重要的是，自从1989年来，在当时政治的不景气和俄罗斯政府系统的危机下，以及西方政党政治和左翼政治的状况下，它已经极具效率和道德性地运转至今。当许多激进主义者诉诸旧有的代表性的政治或“无出路”的悲观主义寻求依靠时，这些政治新思想下的行动以及士兵母亲们的成功，使得我们同时在实践上和观念上拓展了我们对政治抵抗的视野。

正是通过“母亲”的角色对政治道德性的质疑，使得“自我—他人”的区分在政治问题立场的使用上复杂化了。除了父母双亲的地位，再没有其他的主体地位被以如此“无私”的、如此非政治化的非社会化的措辞形容（在社会范围之外）。另外，尽管父系的，更确切地说，双亲中的男性层面被通常视为宗教的、传道者的、文学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社会结构类型的基础，母系的层面也极少被置于其主观的、心灵上的、前象征性的、生理上的，或是精神分析学上的陷阱之外。“成为一个母亲”在这种意义上就不是一个激进主义文学上的或是艺术性试验上的表示了，也不是身份转换、性征的违背以及通常下与“子宫妒羨”相关联的医学和生理奇迹上的表现。它是一个敞开的、安静的邀请，邀请加入、促进、帮助、寻求帮助，并且参与到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由一些与俄罗斯的军事、政府机关相关的女人们组成的群体所进行的政治斗争中。

[1]这种倾向的代表有：A. Solzhenitsyn、有影响的电影导演和演员N. Mikhalkov，艺术家与新学院艺术运动的发起人T. Novikov。

[2]一位重要的俄罗斯哲学家表达了他的不服，说道：“苏珊·鲍莫森审视了莫斯科艺术家法伊比索维奇的作品，我们听说这是1970年代的技术，并且还在继续着。虽然你可以这么说，但艺术家却消失了。他消失在对自己形象的代表的技术中。这种代表系统是如此的陈旧不堪，以至于用这种方法创作的所有作品早就失去了价值。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也工作，我也知道有什么是已经被做了和已经被想过。但这种思考却并不是我自己的！对于乔治·巴塔耶，美国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的阅读和书写，而我只是刚刚开始打算写一些关于他的东西。我现在该做什么？不写关于巴塔耶或者迪·赛德的东西吗？就因为已经有了一整套对于他的思考传统所以我就不能涉足了吗？这样的说法真是太可笑了。我是一个活生生的、思考着，并且书写着、描绘着的生存个体。我存在，我作为。我们迁移着、生存着。对我而言，自由正在于此。”（Valery Podoroga. *Fresh Cream: Contemporary Art in Culture*. Phaidon, 2000, p. 41）

[3]我在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一系列写进党章、艺术宣言或符码的观念和信念。“政党意识形态”并不指

[4] 齐泽克的《棘手话题》(1999)就是这种“没有出路”的例子，这个具有争论性的作品以非常令人信服的态度指向一种政治行为，但这种行为却缺乏普通原则作为基础。

[5] “传统政治植根于区分以及仔细辨别敌友，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按照这个传统，施密特总结道：‘通过特殊的政治划分，我们可以削减一切政治行为和概念，这种划分存在于敌友之间。’”（施密特，引自德里达，1997：84-85）

编辑：郑荔

>> 相关文章

- 超越代表制与从属关系：后苏联俄国的集体行为
- 新中国美术思潮60年
- 从《唐宋绘画史》看滕固的绘画史学思想
-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画论争解析【2】
- “国画”命运转机——1956年“发展国画艺术”
- “国画”由“外”向“内”——1962年“关于中国画的创新与笔墨问题”
- 失败的后现代性
- 从《唐宋绘画史》看滕固的绘画史学思想（2）
-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画论争解析【3】
-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画论争解析
- “国画”发展举步维艰——关于国画创作与接受遗产问题的讨论

更多>>

最新新闻

- 格林伯格之后的艺术理论与批评
- 走向“后观念”：范畴的超越与意义的重启
- 狩猎与矿石
- 现代水墨史写作的方法论基础与问题意识
- 杜尚的“挪用”与文化诗学
- 陆俨少的绘画
- 古今之辩：2000年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现代性之争

最新评论

暂时没有评论!

评论区域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816493 e 匿名发表评论

【温馨提示】

请您在留言评论时：尊重网上道德，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责任；艺术批评家网站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您在艺术批评家网站留言板发表的内容，艺术批评家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参与本留言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不良留言举报电话：010-11000000

